

經元善避難澳門念念不忘興辦女學

侯 傑* 李 釗**

近代著名人士經元善，避難澳門期間仍念念不忘其創辦於上海的中國女學堂，以書信等方式與海內外友人就興辦女學等問題交換意見，提出並不斷完善女學思想，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另外，近代澳門的特殊場域，使經元善的女學思想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這在他的生命歷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近代社會文化變遷中，固然需要偉大的思想理論家登高一呼喚醒世人，也需要敢於拋頭顱灑熱血的勇士，但更需要腳踏實地迎難而上的實幹家。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改良者，經元善沒有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發表宏篇偉論，也沒有像譚嗣同那樣做出可歌可泣的驚世之舉，但是他注重社會實際，富有實幹精神，雖曾被歷史遺忘，終為後人所記起。更值得一提的是，經元善不僅是近代著名紳商、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活動家，還是一位鮮為人知的近代教育家。對於經元善一生的業績，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蔡元培曾概括為“犖犖大者四：曰復石堰，曰籌義賑，曰興女學，曰請皇上親政。”⁽¹⁾

這樣一位被譽為“洋務和改良運動中的實幹家”的經元善，曾因發起反對“己亥立儲”活動，受到慈禧太后的政治迫害，而於1900年2月初避難澳門，卻遭澳門葡萄牙當局囚禁。澳門大炮臺，成為他失去自由的痛苦記憶之地。直至1901年9月，經元善才離開澳門抵達香港。次年夏秋間，他返回上海。在澳門，經元善的政治生命、文化生命並未終結。相反，由於深陷囹圄的經元善時時關心女學等新式文化教育事業，努力使自己苦心經營的中國女學堂得以維持與繼續，從而使其政治生命、文化生命在遠離清朝政治中心的澳門得以延續。他曾撰寫文章追述自己興辦女學等事件活動，牽掛這所在近代歷

史上頗具開創性意義的新式女學。經元善在澳門被囚期間所撰寫的這些著述，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十分寶貴的文獻資料，因此在搜集史料的基礎上，對其進行較為充份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解讀經元善在澳門前後發表的有關女子教育的言論便會發現，他的思想在西化程度較高的澳門經過浸潤之後，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被囚禁在澳門的經元善會發生怎樣的思想變異，值得加以認真探討。

在澳門期間經元善的女學思想

在經元善的個人生命史上，出走澳門，無疑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1900年，五十九歲的經元善橫遭清朝政府去職抄家之禍。他不僅失去了官職、財富等，同時也失去了自己苦心經營的中國女學堂。此前因為反對“己亥立儲”，經元善遠避澳門。1900年秋天，他“認定真宰，一意孤行”的經正書院“費拙停辦”，“公議將總塾停止，另稟南洋留城內分塾，以存碩果。”⁽²⁾岌岌可危的中國女學堂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去秋諸同人因，今歲僕出奔後，幸蔣畹芳、周遠香、丁明玉諸女史，苦心堅守兩節之久，而力乏難支，中秋後亦暫停有待。”⁽³⁾遠在澳門的經元善對於這種情況焦慮萬分，先後多次致信好友汪康年，明確表示女學是他最為關心的事情：“女學係賢元季最關心至要務”，哪怕是時日艱難，

* 侯 傑（1962-），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近代史教授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學術委員、韓國《東亞人文學》編委，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社會史、社會性別史、宗教史等。

** 李 釗（1982-），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近代史研究助理，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社會史、宗教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新政之碩果僅存祇此女學一線綿延，萬不可停而中斷”。由於家產已經被清朝政府查封，又加上訟費鉅大，經元善的生活十分困難。即使如此，他仍決定借錢匯去大洋五十元，資助女學堂。他態度堅決地表示自己“苟獲倖免，此志決不稍懈也”。另外，他還多次請汪康年等人提供經濟支持，以便支撐女學的存在：“經費萬難，諸事不能不藉眾善長扶持”；懇請上海從事女學經營的女士，頂住壓力，渡過難關，“女公學城塾，弟再次勸勉蔣、王兩女史勿盡墮前功，已允竭力續興”。⁽⁴⁾

所有這些正是經元善執着於女學一貫“認定真宰，一意孤行”⁽⁵⁾的生動體現。落難後的重重困難，使他不得不暫時中斷了創辦女學的實踐活動。也恰恰是在這樣的非常時期，讓他有時間認真反思和檢討自己苦心孤詣經營女學的某些思想觀念。透過1900年11月7日他的〈答原口聞一君問〉，即可窺見其心路歷程。

原口聞一君問經元善，在上海創辦中西女學堂時，經元善曾苦心孤詣不遺餘力，現在的情形如何，是否有可能舉而莫廢？“先生曾在滬上竭力創辦女學，可謂苦心孤詣，能見其遠。此時現在情形如何，渴望有舉莫廢否？”⁽⁶⁾

在“女學”這個問題上，經元善首先提出兩點認識：其一，他認為女學古已有之，自己創辦女學是尊從儒家聖賢遺訓，並不是單純師法國外。今日辦女學堂，“匪曰師外，實復古也”⁽⁷⁾。為此，他每每引經據典徵引古代傳說，闡明自己的觀點。儘管他也承認自己“久欽貴國（日本）女學，蒸蒸日上，已並駕歐美，不勝欣羨”⁽⁸⁾，但經元善堅持認為辦女學的目的是“采倣泰西、東瀛師範，以開風氣之先，而復古婦學宏規”⁽⁹⁾。標舉上古，決不僅僅是以此作為對付責難者們的攻擊、誹謗，找到一個護身符。從《經元善集》中任何論及女學的文字來看，這些思想早已滲透到經元善的思想意識裡面，並深刻地影響着其興辦女學的具體實踐活動，可以說是此項事業能夠實行的思想前提。“恭讀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云，順治十三年，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御定內則衍義十六卷，分八大綱、三十二子目。

於是歎曰：女之有學，此我祖宗之家法也。”⁽¹⁰⁾這樣的論述和例舉俯拾即是。“歐母之賢也，不識字何以畫荻？緹縈之孝也，不識字何以上書？”⁽¹¹⁾皆成為興辦女學的理由。

其二，經元善認為賢母為教養國民的根本。“從哺乳飲食學語起，無一處不須教誨，及至六七歲出就外傳，先入為主，其體已端，繪事後素，師教易施，何患賢哲之不勃興哉。”培養女學生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着教子致用，“關雎為王化之原，淑女非無學之人，萬物生於坤土，沃壤始為嘉禾，蒙養全賴母教，寡學豈能課子？”經元善不僅舉出古代文人雅士的生活典故，如“昔蘇老泉長而始學，然其夫人能以母範自居，故卒成二子之賢”；還以近代李鴻章的母親作為典範警醒世人，“又如李中堂太夫人，雖氣度甚宏，而躬親呷飲，未攻詩書，不能如歐母之畫荻，故雖中堂天縱英武，而無母教以植始基，其勳業僅止於是。”經元善還比照了西方的女子教育經驗來強調中國興辦女學的重要性。他提出教育的責任，母教要承擔其中的百分之七十，另外百分之二十有賴於朋友之間的相互勉勵，僅剩下百分之十求助於老師的教誨。⁽¹²⁾經元善的舉證源於本土，結論依據於西方的理論學說，這似乎也是清末民初一部分有識之士所採用的思維方式。

經元善的這些觀點與晚清時期梁啟超等人的“新賢妻良母”主義思想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可以目為同是明智之士的真知灼見。但經元善與他們不同的是把“新賢妻良母”主義引伸到了更高的層次——論及“人材”。他認為“在八股躋通顯中求人材，然如換湯不換藥也”，“人材何由出？富強安可期？……有補於生民，有關於名教，而人棄我取者，厥惟女學。”⁽¹³⁾母教遂十分重要，“國之強弱繫乎人材，欲求人材輩出”，必須重視母教。這是梁啟超等人在倡導女學的過程中不曾論及的部分，也可以說祇有經元善在開辦女學堂之後，經過切身實踐才獲得的更加深刻和彌為珍貴的體會。在“倡導培育‘國民’，從‘女國民’始”等普遍社會認知之外，經元善更是在國民之上揭櫫了“人材”的價值。

從某種角度上講，原口聞一君的問題僅僅是經元善借題發揮的引子。自己已被軟禁在澳門，經元善實際上也並不十分清楚女學“舉莫廢否”，但藉由這樣的特殊時期特殊地點，不失時機地發表個人對興辦女學的看法卻是天賜良機。經元善提出，興辦女學是大勢已在必有人倡行。“滬上初倡女學，是下第一粒粟之萌芽；邇聞八閩兩粵繼起疊興，是栽種一握稻子時代矣。”⁽¹⁴⁾而且，從上古聖賢書到近代所需的賢妻良母，都是興辦女學的重要前提。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人自己興辦女學是“開天義畫”。在他看來，興辦女學的根本目的在於拯救民族、國家的危亡。

在經元善的眼中，女學儼然為強國之本。看似小題大做的提法，卻被他進行了獨特的邏輯解釋。“此時中國垂危久病，正如七竅閉塞，外患癰疽，內蘊熱毒，卻非側重外科不可，維新志士捨生取義，大聲疾呼，的是刀針妙手。僕僅讀靈樞素問，略視本原，祇能辦女學、商務、教務等事，開調理清補之方。”⁽¹⁵⁾興辦中國人自己的學堂乃是治療中國積貧積弱病根的內服良藥。但這劑良藥如何服用，經元善自有其精闢而獨到的見解。他堅持認為，首先是不能割斷傳統文化的血脈。經元善認為，中國的衰敗不在於文明的衰敗，正相反，“孔孟垂訓名存實亡，師道久已不立，更乏蒙養”，需要的是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其次，他極力反對“中國此根不拔，永無振興之日”的說法，認為這樣帶來的弊病在於，“施諸學新學之學生，未免鑿柄”。經元善態度明確地表示，這樣的做法“即顯背祖制大拂民心者”，而且還非常深刻地指出，如果驟然倣效鄰邦的政教，即使各邑遍設學堂，所造就者不過華服洋人。他甚至還有些偏激地認為：教會學校猖獗於中國是中國人的恥辱。“彼士來遊，憫吾窘弱，倡建義學，求我童蒙，教會所至女塾接軌，匪為先民之恫，也為中國之差。”⁽¹⁶⁾在經元善看來，“欲求富強，須端蒙養，而萬不能不從女學起點，否則再教三十年，非特依然如故，更恐變本加厲矣。”

由此可見，經元善在論述女學的過程中，真知灼見不時閃現，對中國實際情形和西方教育理念之

間的矛盾等思考十分精闢，雖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偏頗之處。歸根結蒂，其思想特徵仍可以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來概括。經元善對聖賢學說格外重視，視其為本原之學。這一點在“教育宗旨以彝倫為本”⁽¹⁷⁾的論說中得到充份顯示。借西法復古制的曲說，典型地反映了晚清精英智識分子們的矛盾心態。經元善被難澳門，使得他在反思自己創辦女學堂等問題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難能可貴的是，此時的經元善不僅把女學看作中國復興的一劑良藥，更是拯救他免於牢獄之災的一線希望。他堅信：“因辦女學而獲譴，各國更不肯坐視。”儘管使自己獲罪者恰恰是清朝政府權傾一時的掌權女性——慈禧太后，但是經元善還天真地認為如果慈禧太后能夠做做英國的君主，任用曹大家這樣的人在宮中輔導之，“何止小人道長，鑄成此次大錯”。換言之，如果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能夠在政壇上起到微薄之力的話，經元善以為或許就不會受此囹圄之苦。假如不能馬上奏效，他也寄希望於將來：“期以卅年，吾皇上花甲萬壽慶典時，必能明效大著矣。”經元善希圖他所盡力經營的教育事業，能夠給他同樣竭力維護的儒教、皇權帶來新的生機與活力。

在澳門期間，經元善還做過〈經節婦羅安人家傳〉、〈書蓮山先生羅安人傳後〉等涉及女性的短文，也可以幫助人們進一步認識他與女學的關係。經元善在文章中以儒家倫常規範褒揚經節婦的美德，特別強調“安人略通書史，上侍邁姑，下撫兒媳，送死事生，儀無或愆，意無不摯”⁽¹⁸⁾。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如此簡單概括安節婦的言辭中，經元善也不忘在安節婦能恪守孝道操持家務的前面加上了“略通書史”這樣的文字，以突出其接受過教育具有一定學識的背景。實際上這既是他所解讀的安節婦節烈行為的原因，也是其塑造一位女性楷模所應該具有的前提條件，無形中表露了女學在經元善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傳遞出在塑造典範女性的過程中女學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和價值。而〈書蓮山先生羅安人傳後〉則更讓後人感受到極大的震撼。經元善坦言自己曾經反覆思索經節婦的“未婚守節”之舉，竟然不得其解，但在澳門聽聞西方新學新說之

後，卻悟出了一番道理。“迨近歲言新學者，張自由之幟，余乃憬然悟，躍然起曰，是可以伸吾說矣！”其後，經元善大談自己對自由學說的個人領悟：“自由者，何謂也？謂不與人相涉也。”⁽¹⁹⁾“然則自由者，精之如為仁之道，粗直入飲食男女之慾。”⁽²⁰⁾儘管經元善對西方傳承流轉幾千年的自由學說不甚了了，理解得並不深入和精確，卻將對自由的個人理解用於解釋男女之間的感情，或許也是“戀愛自由”的濫觴。“飲食男女，既為一例，男女之情，獨不可自由乎？亦豈有異於飲食乎？”“還其飲食男女之自由，即是為人由己之自由。”⁽²¹⁾經元善將男女之間的感情看作是脫離了禮儀規範範疇的自然慾求，可以自主支配，無疑超越了其出走澳門前的思想水平，亦超越了“男女大防”的時代局限。或許經元善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在文章中透露出的資訊為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對很多問題都需要經過認真學習和思考才能獲得新的認識。澳門，恰巧給經元善提供了這樣一個不期而遇的機會。

出走澳門前後經元善女學思想的比較

1902年初夏，經元善返回上海。此時的他雖然體衰多病，很少參加社會活動，唯對女學念念不忘。他自己如是說：“僕夢寐之間不忘女學。”1902年，上海中國女學會第一次大會召開，他抱病參加，發表了講演。細察〈在上海女學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演說〉，不難發現經元善對於西學的看法較前愈發客觀，對於興辦女學愈發重視，對於社會上男女兩性的性別關係也有了更為精闢的見解。

在演說中，經元善開門見山的第一句話，就是常被研究近代女學思想者們反復徵引的一段名言：“夫女學本吾華上古所自有，並非泰西新法，第遏密已久，禮失求野，勢不能不采人所長。”⁽²²⁾或許尚沒有學者注意到，經元善“禮失求野，勢不能不采人所長”的提法並不見於其早期思想，而是出走澳門、旅居香港之後逐漸形成的。誠然經元善在表達其主張學習西方、倡辦女學等觀點的前面仍然加諸“女學本吾華上古所自有”這樣的文字，但這已和1897年草擬〈中國女學堂緣起〉時的說法頗為相異。

當時的文字表述為：“聖人皆其蘊奧而經旨愈益光晶，以孝、敬、教、禮、讓、慈、勤之德求之婦女，以佐忠訓忠、贊廉重賢、敦仁愛民、好學著書之事望閭闔。”⁽²³⁾而1897年〈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的第一條就是：“學堂之社悉尊吾儒聖教，堂中亦恭奉至聖先師神位。”⁽²⁴⁾顯然，傳統的因素被保留下來。而出走澳門之後，經元善的眼界有所擴大，最起碼已經不再囿於從聖人言辭中尋找興辦女學的上古訓示了，世界的概念逐漸代替了以往的天下觀念：“查歐美婦女，無人不學，其才識不遜男子”，“即東鄰日本三島，研究新理，急起直追，亦鄭重夫乎女學，實心實力。”⁽²⁵⁾歐美和日本對女學的重視，極大地刺激了經元善，也更堅定了他宣傳女學和興辦女學的決心。

回到上海之後，經元善坦言，出走澳門讓他在新的高度上發現了興辦女學的價值和重要。“此次來遊港澳，所接東西賢士大夫，實繁有徒，縱談政教，益知女學關係，更重於男學。”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經歷，才使得經元善明確提出：“苟一息之尚存，即此志之不懈。”⁽²⁶⁾經元善所以會對女學如此矢志不移，態度堅定，實有賴於他對男女兩性關係的重新認識。

早期的經元善將“興女學以成放乎四海而皆準之化”，因為“今日所謂聲光氣化靈全體諸學，東西各邦所以興養立教……女學不過其一端而已。”換言之，女學是西學中和光電生化並列的一部分，興辦女學的目的和學習格致之術一樣就是為了挽救時局，圖國自強。他在“甲午後……苦心孤詣創設女學堂，以為自強之圖”⁽²⁷⁾，祇是把女性解放問題看作是維新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女性作為被喚醒的群體，被看作或是為生計操勞的貧苦婦人，“繩束盜牖中，其蓬首椎髻荊釵布裙者，尚能操井臼習縫紉分任家務，以補日用之不足；或且受釐肆肆躬親交易，孜孜焉無失朝作夜息之常”；或是衣食無憂任人把玩的閨閣之女，“惟知洞其耳，枯其足，塗飾其面，一若僅供天地間玩好之用。”⁽²⁸⁾世人“視婦女如瘤贅無用之廢物。未出閣前既閑之防之，不使妄行一步，既適人後復禁之錮之。”⁽²⁹⁾經元

善對於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其對女性的社會生存狀況、社會地位的描述、分析頗為入木三分。但是發現和批判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實並不完全等於主動提倡男女平等，甚至我們有理由認為，經元善把女性刻劃成為“孱弱、無用、不生利”的形象，是其先入為主地要證明女性是“被動員、被改良”的群體。由於其先驗的觀念，即女性必須承擔起解救國家、民族危機的時代重任而被動員起來，於是，便將女性的生活刻劃為等待、被動員的狀態。“中國人數號為四萬萬，而婦女因不讀書，遂不能明天下之事，凡言論事功，皆依靠男子，則中國人取其一半矣。”⁽³⁰⁾至於其是否真正意識到男女兩性之間應該平等，以及如何實現男女平權，顯然是另外的問題。

可是在1902年6月26日上海女學會第一次會議上，經元善公開樹起了男女平等的大旗，鼓勵女性應該有堅毅的精神，承擔起時代賦予的責任與權利。“建樹男女平等特幟，非巾幗中人有華盛頓之壯志不可。肇端伊始雖必藉明通男子翊佐，然終須女子自具精魂毅魄，堅忍肩任，方可期望奏績之日。”⁽³¹⁾他的女學思想、社會性別觀念無疑增加了些許激進因素。這樣的表述與1903年出版的標誌中國女權大興的力作《女界鐘》並無二致，說明經元善的女學思想有了一個比較大的躍昇。

結語

出走澳門後，特殊的境遇激發了經元善對國家、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深沉憂思：“異日彼族，因利乘便之舉，變夏為夷之謀，魚肉我華，牛馬我華，四百兆神明之胄日弱一日，日愚一日，尚復有重見天時耶？”⁽³²⁾這種憂患圖強的愛國意識促使他對救國之術進行更加深刻的思考。他認為女學不開母教不力是國家衰落的原因，於是更加堅定了自己在出走澳門之前業已開始形成的興辦女學的意願。

尤須指出的是，出走澳門後的經元善，思想觀念發生了不小變化，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濃厚的傳統綱常倫理思想的束縛，比較深刻地感受到西方平等自由等思想觀念，逐漸意識到女性解放、男女

平等的重要性。不僅如此，他還從人性的角度突破綱常倫理倡言男女平等，重視女子教育，甚至大膽提出“男女既同為人，即可同參天地”等主張。

【註】

- (1) 蔡元培：《居易初集》（增訂本）序，上海同文社1902年版。
- (2) (3) (5) (6) (8) (13) 經元善：〈答原口聞一君問〉，《居易初集》（增訂本）第1卷，上海同文社1902年版，頁4-16。
- (4)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劄》（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頁2428-2429。
- (7) 刻溪聲叟（經元善）：〈上海女學會演說〉，《選報》1902年6月，第20期。
- (9) 〈中國女學會書塾章程〉，《新聞報》1897年3月17-20日。
- (10) 經元善：〈中國女學堂緣起〉，《女學集議初編》，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 (11) 經元善：〈論上海創設女學堂之善〉，《女學集議初編》，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 (12) 經元善：《中國女學堂稟北南洋大臣稿》，《女學集議初編》，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 (14) 刻溪聲叟（經元善）：〈上海女學會演說〉，《選報》，1902年6月，第20期。
- (15) 經元善：〈答原口聞一君問〉，《居易初集》（增訂本）第1卷，光緒壬寅七月上海同文社出版，頁4-16。
- (16) 經元善：〈創議設立女學堂啟〉，《女學集議初編》，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 (17) 〈中國女學會書塾章程〉，《新聞報》1897年3月17-20日。
- (18) 經元善：〈經節婦羅安人傳〉（1900年8月），虞和平：《經元善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頁325。
- (19) (20) (21) 經元善：〈書蓮山先生羅安人傳後〉，虞和平：《經元善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頁325；頁326；頁326。
- (22) 刻溪聲叟（經元善）：〈上海女學會演說〉，《選報》1902年6月，第20期。
- (23) (27) 經元善：〈中國女學堂緣起〉，《居易初集》1卷，上海同文社1902年版。
- (24) 〈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時務報》第47冊，1897年12月。
- (25) 刻溪聲叟（經元善）：〈上海女學會演說〉，《選報》1902年6月，第20期。
- (26) 經元善：〈上外務部王大臣稟〉，虞和平：《經元善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頁371。
- (28) 經元善：〈勸女子讀書說〉，《居易初集》3卷，上海同文社1902年版。
- (29) 經元善：〈論上海創設女學堂之善〉，虞和平：《經元善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頁189。
- (30) 經元善：〈女學堂答杭垣友人書〉，虞和平：《經元善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頁207。
- (31) 經元善：〈在上海女學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演說〉（1902年6月26日），虞和平：《經元善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頁379。
- (32) 經元善：〈勸金陵都人士創開女學堂啟〉，《女學集議初編》，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